

# 中国版《放牛班的春天》

新闻考古

在9月4日的G20杭州峰会欢迎晚宴上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时说，“140年前，1876年的6月，曾经当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于杭州，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，他的骨灰就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。”

司徒雷登，一个中国人熟悉又隔膜的名字，这一次作为中美两国友谊的符号，出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。

从血统上说，司徒雷登是纯粹的美国人，他的父母都是在清末就来到中国的传教士。但司徒雷登自己说，他“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”。司徒雷登的“中国人”身份，始于杭州，最后又因为他的骨灰归葬于此，也终于杭州。

1876年6月，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（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）。直到11岁回到美国读书，他都生活在杭州，在杭州度过了完整的童年，学会了一口纯正的杭州话，并认杭州为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
1904年，司徒雷登结婚后偕妻子回到中国，第一站也是杭州。在这之后，他的主要事业是传教，并钻研汉语。1908年开始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，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，辛亥革命时曾兼任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。在杭州，他参加创建了育英书院，即后来的之江大学，他的弟弟后来成为之江大学校长。

司徒雷登一生最辉煌的成就，是因为他创办并长期主持燕京大学。在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，司徒雷登首先是一个教育家，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。

清末，义和团烧毁了美英教会创办的汇文大学、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女学校舍，创办者后来计划重建，将其合并为一所大学。但在学校名称和校长人选上分歧很大，后来达成协议：选一位“局外人”任校长。非常了解中国，且学养出众、令名远播的司徒雷登，成为在华美国人公认的校长人选。

司徒雷登接手了这个“无法收拾的烂摊子”。他骑着毛驴为新建校舍四处奔波，为筹集办学经费四处化缘，用传教的虔诚和毅力，在北京西部建起了一座园林一样优美的大学。如今，燕京大学早已不复存在，但司徒雷登留下的校园，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。今日燕园的湖光塔影、中国风格的校长办公楼和学生宿舍，基本保持了司徒雷登主持设计的原貌。

燕京大学虽然是教会学校，但司徒雷登却提出了“使燕大彻底中国化”原则。他说：“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、真正意义上的大学，至于信仰什么，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”。作为教育家，他深知“大学不仅要有大楼，还要有大师”的道理，聘请了当时最著名的中国学者来校任教，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。短短时间内，燕大名师云集，几乎个个如雷贯耳：洪业、俞平伯、周作人、郑振铎、陈垣、顾颉刚、张东荪、冯友兰……

同时，他积极推动燕京大学与一流名校交流合作，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，作为一个学术项目至今仍备受推崇，被视为学术质量的保证。司徒雷登出色的建设和经营，让燕京大学的知名度和学术水平迅速提升，短短十多年，已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，在80多年前，就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。

燕京大学存在了33年，注册学生不到一万人，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的，就超过100人，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，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。燕京大学还是中国新闻学、社会学教育最早的开拓者，培养的著名校友有冰心、费孝通、侯仁之、杨绛等，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，也曾是司徒雷登的学生。

作为校长，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，九·一八事变后，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游行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他回拒绝对日合作，被关在集中营，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。在日本侵华北期间，大批燕京学子从沦陷区奔赴解放区，司徒雷登亲自为他们送行。

司徒雷登后半生背上“美国在中国彻底失败的象征”的标签，源于他于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。在大使任上，他曾受邀到杭州参加活动并祭扫父母亲之墓，并被授予“杭州市荣誉公民”称号。当时中国人这样评价他，“既是政客又是学者，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”。

1949年，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前夕，司徒雷登选择留在广州，希望充当中国内战调停者的角色，但最终因为形势剧变，不得不悄然返回美国，随即退休直至去世。

因为他在驻华大使任上的表现，“举世无敌敌”的司徒雷登成了各方眼中都受待见的人。在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因为那篇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著名文章，他成了对华侵略政策代理人、声名狼藉的失败者的代名词；回到美国，他被支持国民党和奉行麦卡锡主义的当局“禁言”，还被一些人骚扰攻击，贫病交加，孤独落寞。如果不是私人秘书傅汲波一家悉心照料，晚年会更加凄凉。

1962年9月，卧病多年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。他最后的意愿，就是把骨灰送回中国，葬在燕京大学校园。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，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。在早已成了北京大学校园的燕园，司徒雷登留下的建筑仍在，但校园里至今没有一座司徒雷登的塑像，早年安葬于此的其妻墓地，也不知所终。

在傅汲波后人持续不懈的推动下，司徒雷登的第二故乡杭州，最终接纳了他。2008年11月17日，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。虽然不是遵照他遗愿的最优选择，但杭州是他出生成长的第二故乡，也是他父母和弟弟的长眠之地。生于斯、葬于斯，也算完成了他叶落归根的心愿。

杭州，这个美丽包容的城市，给了司徒雷登这个中国人“熟悉的陌生人”故乡的温暖，也成就了两个大国之间超越历史的友好佳话。

## 杭州给了司徒雷登故乡的温暖

丁永勋

### “芳名永存”

90届(2)班，是程芳作为班主任带的第一届学生。这个班的孩子们毕业了，师生情谊也一直延续了下来。

老师恋爱了。他们紧张，尾随，考察……老师结婚了。看着老师脸上幸福的笑容，他们有些悻悻然，“齐大哥把程老师抢走了。”

在杭州工作的同学，不时邀请老师“家宴”，拖家带口地一起聚餐。

老师，当年记挂着他们的点点滴滴，现在记挂的人，又多了他们的娃：“你们家孩子是不是要上幼儿园了？”“孩子在读哪个小学？”“对孩子，要讲方法。”……

已经在工作上成为骨干的学生们，早已平视看世界。面对自己的初中班主任，他们依旧觉得有许多要学的。

有了微信后，程芳在手机移动端，还是“孩子王”。“程老师在群里一发言，大家都像打鸡血，马上响应”；“我们都是40多岁的人，在微信群里永远10多岁”；有人工作忙到两只手都拿着电话，但他觉得最重要的事，是在群里回复老师。

2016年4月28日，“马儿”出差，在群里问，“有谁在苏州？晚上一起喝酒。”老师说，“半夜里个个在苏州。”

这是程芳最后一次在90届(2)班的微信群里说话。

坏消息来得突然。4月29日晚八时许，时任杭州西溪中学校长的程芳被发现倒在办公室中，灯亮着，51岁的她再也没有醒来。

那一夜，周琦在梦里，回到了他的中学时代，见到了程老师，“毕业后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。”

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，凌晨1点，“小鹿”醒来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直到她收到“马儿”的微信，“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”

感念，无法解释。

90届(2)班的学生们纷纷赶来守灵。

前后半个月，他们遇到了程老师带过的其他学生、带过的老师。在大家的追忆中，他们听到了：程老师带班一直都不挑学生，甚至会偏爱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一些；无论成绩好或弱，她都一视同仁，她喜欢在孩子的姓后面加上“宝贝”两个字，譬如，“钟宝贝”“王宝贝”“裘宝贝”；程老师后来当了校长，她的理念是“不能只对老师提要求，而不做保障”，“每个老师后面都有一个家”……

在这群“中学生”的记忆里，“程妈”，这位老师、朋友、亲人，圆脸上永远带着盈盈笑意，“芳名长存”。

“程老师带班一直都不挑学生，甚至会偏爱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一些；她喜欢在孩子的姓后面加上‘宝贝’两个字；程老师后来当了校长，她的理念是‘不能只对老师提要求，而不做保障’‘每个老师后面都有一个家’……”



▲程芳老师工作近照。照片由程芳家人提供

班风改变了，但成绩并没有立马转型。

在随后的物理期中考试，孩子们没有获得好成绩，大家心情低落，觉得“对不起老师”。“小姑娘”没有责备孩子们，她请示了学校，而后带着他们去西湖划船。

四五月的晴日，西湖之上，船桨点水，涟漪一圈圈晕开。“老师一边开导我们，一边介绍船与水的物理知识”；“我至今还记得那个优美的公式： $F_{浮} = \rho_{液} g V_{排}$ 。这在当时，在我们还是小小少年的心中，这种教学方式是这样的引人入胜。”钱李军说。

### 他们改口叫“程妈”

打动孩子们的，不只是“小姑娘”的教学方法和耐心。

在那个奉行“棍棒之下出孝子”理念的时代，“我们的爸妈，把我们送去学校，都和老师说，孩子不听话，你随便打，随便骂。”

“原来教过我们的一些老师，动辄就批评我们、打击我们，凡事喜欢上纲上线，一点错就要处分，杀鸡儆猴给我们看，有同学就因此离开学校。”

相比之下，程芳就像孩子们的姐姐。对于男女同学之间那种朦胧的情愫，这个“姐姐”只是持“只八卦、不干预”的态度。

有人后来问她，“为啥不管管？”她说，如果直接命令“不许早恋”，孩子们只会瞒着你，“可能他们闯了祸我也不知道，那才是我最怕的。”

有“愤怒的少年”曾在学校里贴标语，是“姐姐”在校长那里说情，“作保”，免除了处分之虞。

班上最叛逆的女生，成了“姐姐”最宝贝的女生。直到现在，她都喊程芳为“程妈”。

# 废钢烂铁敲响山里娃的梦想

“在莽莽的大山中，有学校的地方就会有钟声，有钟声的地方就会有书声，有书声的地方就会有希望”



▲这是广西山区部分学校上下课所敲的“钟”。摄影：陆波岸

他厚厚的嘴唇常常呈暗红色，以致当时童真无邪的我们一直认为，黄老师嘴唇的形状和颜色是因为吹哨子造成的。就是在我这位启蒙老师离开人世30年后的今天，每当看到有人吹哨子或者听到哨子声，我都不禁想起他，想起他吹哨子的样子，想起他在泥土墙的教室里手握课本，来回踱步领着我们抑扬顿挫朗读课文的样子。

我故乡村完小上下课所敲的钟，是村里一座有超过百年历史庙宇的生铁铸钟，上面铸有“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”等文字，差不多是半个人那么高，要两个壮汉才能抬起，那洪亮浑厚的钟声，可以在五里范围的大山回荡，经久不息。在那十年浩劫中，那座规模宏大、建筑考究的古庙宇遭受破坏，许多设施被践踏推倒，所幸这口古

钟没被砸烂，人们把它搬到离庙宇不远的学校去，作为学校作息时所敲的钟，让它继续传承这片大山源远流长的文脉，呵护这片大山每一个梦想与希望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天，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学校附近放羊时，跑到学校里抡起木棒狠劲敲打着这口古钟玩耍，没想到这口历经无数岁月腥风血雨洗礼、见证无数沧海桑田人世变迁的古钟，受不了那一棒接着一棒不知轻重的抡打，钟体从上到下裂开了一条缝，曾经洪亮的钟声一下子沙哑呜咽。为了保护它，学校作息时不再敲打这口古钟，让它静静地挂在学校木楼的廊檐下，继续守护着这片大山的日出日落，守护着这片大山孩子们的

本报记者余靖静

有一位老师，第一次做班主任，遇上了一群“小刺头”。

20多年后，这位老师因突发不适，倒在了工作岗位上。

她带的第一个班级的“小刺头”们——当年的初中生，如今都已奔五——辗转找到记者，就想说一说这段师生故事。

听过的人说，这个故事，像是中国的《放牛班的春天》。

### 他们叫她“小姑娘”

1988年秋天，杭州求是中学，初二(2)班，全校最调皮捣蛋的一个班，来了一位新班主任。这个班，“皮”到什么程度？

上课时像菜市场，还给老师背后贴纸条；下课了像跑马场，到学校附近的田里捉泥鳅、放风筝、“顺”番薯；明明小学里都学过英语，初一的期末考试，三、四十分的屡见不鲜；老师们个个头疼，批评、处罚都用过，无效。

新班主任名叫程芳，22岁，娃娃脸，马尾辫，个子不到一米六。一群“小刺头”打量着她，“小姑娘。怕啥？”“不欺负她就不错了”。

家长们的第一印象也大致如此。她到女生家家访，家长问孩子，“你带了个同学回来？”到男生家家访，家长问孩子，“你带了个女朋友回来？”

可慢慢地，调皮鬼们发现，这个“小姑娘”，可不太一样。

他们放风筝时，悄悄取了“小姑娘”的丝巾当风筝的尾巴，线断了，风筝飘走了，“小姑娘”发现，只笑嘻嘻。

“小姑娘”和他们一起去公园，孩子们图新鲜，翻墙逃票，她也跟着翻，只是叮嘱他们说，要是被“逮”住了，“不要说我是你们老师”。

选班干部，原来都是老师指定，“小姑娘”来了，就变成由全体同学投票决定。

胡卫，调皮鬼的“头儿”，就这样被选成了班长。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个女生落选。“我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，觉得被尊重。就算为了面子，我也要做出样子。”20多年后，胡卫回忆说。

有一些孩子回家后就“放羊”，不做作业。“小姑娘”就在放学后把他们留下来，陪着一起做作业，做完才让走。

“看到老师愿意放弃自己很多休息时间，我们也懂事了。”

开始不情愿的三四个孩子，逐渐变成了主动留下的七八个孩子。班上块头最大的男生“马儿”，从此成了“小姑娘”的“跟屁虫”——做完作业，还主动送老师回家。同学在路上遇见，觉得这场面“很违和”。

陆波岸

又是一年开学季，深山里许许多多学校历经近两个月的沉静后，又陆陆续续听到回荡山间的钟声。我也曾是大山求学者，每当想起山里阵阵悠远清脆的钟声，就像儿时上学前母亲那句暖心窝的叮咛再次回响心头，难以忘怀，无法割舍。

钟声是大山孩子希望与梦想的守候，寒来暑往，风雨无阻。在莽莽的大山中，有学校的地方就会有钟声，有钟声的地方就会有书声，有书声的地方就会有希望。对于山里人来说，每当听到学校的钟声响起，就像三月听到布谷催春之声一样。

钟声来自一个个挂在学校里的“钟”。由于条件限制，大山很多学校用于作息指令的不是电铃，也不是现代化广播系统，往往是一块当作钟来敲的锈迹斑斑的废旧钢板铁片，有的是一块废旧钢板，有的是一片残缺型头，有的是一块汽车废旧钢圈、有的是一截废旧钢管……有的挂在教室的走廊里，有的挂在校园的大树上，很多一挂就是几十年，就像大山里无数个默默坚守的老师一样，任劳任怨，不问功名，日复一日敲响自己，催促别人求知前行的脚步。

这些“钟”有固定的敲法和节奏，比如预备钟声是“当当 当当 当当”，上课钟声是“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当”，下课钟声是“当 当 当”等等，决不能敲乱，也不能乱敲。每天，值班老师都会准点拿起一根铁棒或一把铁锤，有节奏地敲响这个钟，指令学校师生按时作息。钟声传遍校园每一个角落，回响在大山深处每一个人的心田，人们通过钟声的普及，可以知道学校是在上课还是下课。

在钟表没有普及的年代，山里很多人根据钟声安排自己的劳作和生活时间，学校放晚学的钟声响过之后，在地头山上劳作的人们会赶忙收手头的活儿，炊烟往往也在这时次第袅袅升起，村童唤牧归，飞鸟相与还。

我上小学三年级之前，就读的教学点没有这样“高大上”的钟，也没有听到过这样可以响彻山谷的钟声，我们的作息指令是一个用绳子挂在老师办公室泥土墙上的铁哨子。每天，这个教学点唯一的教师黄汉老师会按时拿下这个哨子，放在嘴唇之间吸足了气鼓着腮帮“嗒嗒嗒”地吹响，叫他所教的三个复式班十几个孩子上课、下课或者放学。哨子一吹完，又被他高高挂起，生怕有淘气的学生趁老师不注意取下乱吹，扰乱了学校固定的作息秩序。

黄老师生来嘴唇厚实，也许是抽烟等原因，